

曹新宇，《祖師的族譜：明清白蓮教社會歷史調查》，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305頁。

曹新宇長期從事明清秘密社會與民間宗教研究，其主編的大型文獻集《明清秘密社會史料擷珍·黃天道卷》於2013年由臺灣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該套文獻集乃2012年作者在河北省萬全縣田野考察時發現的一批黃天道孤本經卷，包括大量的經摺裝寶卷、符圖、手本、家譜等，以及9種罕見的清代彩繪帛書，極其珍貴，《祖師的族譜：明清白蓮教社會歷史調查》便是利用這批新文獻進行研究的成果。

本書除引言、附錄外，共分為六章。在第一章「村落——膳房堡的故事」中，作者以20世紀40年代李世瑜對膳房堡一帶黃天道的研究為基礎，對新發現的黃天道「文庫」進行解讀與研究，結合口述訪談、民間傳說、殘存碑刻等材料，推進了對黃天道的認識。從「普明祖師爺」李賓開創黃天道門，到被官府忽略的許姓繼承道統，再到聘請佛、道二教聖職人員擔任主持以及「新道門」明宗會的引入，接着到黃天道的地方化與村社化，最後到黃天道的近代命運，這一系列故事完整呈現了黃天道在不同階段的生存實態。實際上，作者想藉此回應的是西方學者將「道門」從傳統中國宗教和村社環境中「異化」出來的觀點。以黃天道為代表的傳統道門，不僅與佛、道二教以及新道門達成某種共存的「層疊」，還完成了從宗姓掌控的教派到「人人有份」的村社化道門的轉型。

通過第一章黃天道教案的例子可以發現，村落為道門提供了「地方化」策略的安全性保障。實際上，除了村落能夠幫助民間教派從上到下化解政治壓力外，宗族能夠為民間教派提供另一層保護機制，在第二章「宗族——祖師的族譜」中，作者便從2012年在萬全縣新發現的李姓《老祖家譜》入手，考察了宗族在明清秘密宗教「地方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該譜不僅譜系列有「李賓」與「李蔚」等能夠和清朝檔案相互印證的關鍵名字，並且譜序中還提到李氏的原籍為山西壽陽。順着這條線索，作者在壽陽韓溝村發現了一張李姓大型「家布」，布上畫有普明佛與普光佛的畫像，這不僅證實了此地傳說的「佛祖」就是李賓，還證實了《老祖家譜》確為李賓家的族譜。值得注意的是，李姓家布所記錄的「始祖」乃清代的祖先，卻通過製造出「想像」的空間，將生活於明中期的普明與普光擠進「始祖」之下，令黃天道得以回歸原籍，該過程生動展現了鄉村宗族與秘密宗教的長期互動關係。

第三章「衛所——戍邊軍戶的來源與生計」將李賓家族的生存軌跡納入衛所制度沿革的脈絡中進行審視，有關李賓家族的線索大體如下。洪武二十五年（1392），萬全李姓祖軍抽軍赴萬全左衛戍邊。正德年間，李昌（李賓曾祖）、李志道（李賓祖父）移居萬全右衛膳房堡守墩，但沒有繼承李姓祖軍正軍的身分，僅成為餘丁，李賓則極可能是戶下的「空丁」。嘉靖年間，北方的墩軍軍事地位突出，配備多種火器，黃天道內李賓曾損傷一目的傳說即與此有關。另外，聯繫普佛寺「麻井苦拷富商賠補」的壁畫與嘉靖三十八年「清查邊儲」的事件，則可推測李賓在萬全右衛的「差使」很可能與經手錢糧有關。總體而言，本章是將李賓軍戶家族的案例套入現有衛所制度的研究結論之中，通過還原當時衛所軍戶的生存實態來展示李賓「修行」與「創教」的生活背景，並據此解釋黃天道內有關李賓的傳說。

第四章「夫婦——普明、普光組成的邊堡家庭」，作者主要通過對新發現黃天道經書的解讀，圍繞李賓、王氏的婚姻而展開論述。在衛所制度下，衛軍無妻不能赴戍，軍戶餘丁則面臨婚姻困難，李賓與王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天緣良湊」結為夫婦。在黃天道信仰中，通過婚育得證「人倫大道」是神聖的行為與身心修煉的前提，教祖夫婦便是用「泥水金丹」的功法進行雙修，因此，黃天道信眾均提倡「在家修行」。此外，據黃天道經卷記載，在李賓去世後，其妻王氏並未直接成為祖師，她是憑藉自身的努力與才能，最終才得道著經，並繼承了黃天道的道統。

在第五章與第六章中，作者聚焦於解讀新發現黃天道文獻的具體經文，從而解答了一些困擾學界多年的問題。第五章「經典（上）——「成化禁書」的消息」主要討論了黃天道文獻與「成化禁書」的關聯性問題。作者指出，新公布的黃天道文獻《三煞截鬼經》同時出現在「成化禁書」目錄之中，通過對經文的解讀發現，其經文內容與禁書目錄裡另一種《照仙爐經》存在對應聯繫，因此可以推斷《三煞截鬼經》等黃天道文獻與「成化禁書」的確存在關聯，並非如王見川所言僅是簡單的借名而已。而《照仙爐經》等經卷的經文，又可與檔案史料的記載相對應，因此它們很大程度上是「成化禁書」的原抄。此外，黃天道文獻與「成化禁書」中都存有關於「銀城」信仰的經卷，這證明了「銀城信仰」在民間教門的延續性。這些觀點，都是學界較少注意到的方面。

在第六章「經典（下）——「最早的」教派經卷」中，作者則突破解決了學界爭論多年的難題——民間教派文獻《佛說皇極結果寶卷》的源流與所屬教派問題。首先，作者考證出天津市圖書館謝忠岳所藏《佛說皇極收元寶

卷》是《佛說皇極結果寶卷》的底本，但卷內殘片的「永樂十」字樣屬於脫頁錯置，與刊刻年代無關，且該本與路工本《結果寶卷》一樣，均為清代複刻本。其次，作者發現《收元寶卷》中記載的「摘光祖」被《結果寶卷》替換為「當來祖」，由此隱藏了黃天道十祖普賢（李賓孫女）的身分。普賢活動於萬曆時期，寶卷上「宣德五年」的題識乃偽刻，這亦反證上述對《結果寶卷》刊刻年代推測的正確性。書末共收附錄四篇，前兩篇分別是《明清秘密社會史料擷珍·黃天道卷》叢書的導言與總目錄，第三篇是52幅新發現黃天道符圖牌印的附圖，第四篇是王見川與李世偉對本書的評述。

總體而言，本書為讀者呈現了兩個層面的歷史。第一層是明清時期黃天道的歷史，第二層是20世紀40年代李世瑜所書寫的黃天道歷史，由此呈現出了古、近、今三幅圖景。本書在敘述的過程中，大多問題都離不開對李世瑜研究的回應，這表明，民間秘密宗教的研究發展緩慢，時至今日還在與第一代學者李世瑜1948年所著的《現代華北秘密宗教》對話。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則在於，民間秘密宗教的研究難度與門檻較高，特別是民間宗教中充斥着各種雜學，如術數、曆法、堪輿、占卜、謠讖、修煉等「迷信」，而這些知識體系如今並未被納入現代教育內容之中，只能依靠研究者的自學與積累。因此，本書最大的亮點就在於作者對此類民間雜學的精通程度以及對黃天道經文卓越的解讀水準。比如在第六章摘光祖身分的考證中，研究者必須嫻熟掌握古代天文曆法知識以及宗教知識，才能破解教派寶卷中通過拆字法、隱喻法等方式隱藏起來的信息，從而考證出「摘光祖」即黃天道十祖普賢。從本書的邏輯演進過程可以看出，對教派寶卷的解密往往是進一步推進研究的關鍵，因此，對檔案的解讀能力與對「迷信」雜學的知識儲備均是研究秘密宗教的必備技能，這也難怪諸多研究者只能對該領域望而卻步了。

本書的問世向學界表明，研究秘密宗教若要有所推進，必須將官方檔案與民間寶卷相結合，二者缺一不可。若研究者僅利用官方檔案的記載，而缺少對寶卷的解讀，便只能從側面了解民間教派的大致發展情況，梳理出官方視角的教派查禁史，根本無法深入教派內部，從民間的視野去呈現教派發展史。進而，若能將原屬不同視域的民間文獻、口述傳說與官方檔案互相契合到同一幅歷史畫卷之中，加以合理的推測，便可能獲得反常識的意外發現。比如在第一章清政府承辦碧天寺的案件中，按照常理來說，面對官府的查禁壓力，民間教派團體應該選擇明哲保身，近期內盡量避免宗教活動。然而教派文獻卻反映出了完全相反的情況，教派成員不僅不規避被查禁的風險，竟然還在道門帛書長卷中公然開列姓名與住址！這是因為對他們而言，道門內

部、道派之間的競爭與傾軋，比官府的查辦更加日常和恐怖。此類信息是很難通過官方檔案記載獲知的。

民間寶卷的搜集與解讀，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本書所利用的這批新發現黃天道民間文書，半個多世紀以前，李世瑜實際上已尋至其地，可惜缺了點運氣，與它們失之交臂。66年後，作者「因緣得見」，並將之公諸學界，此後又過了3年，方才完成本書的寫作。作者在後記中自稱，寫作本書歷時十多年，不可謂不久。可見在民間秘密宗教研究領域，勞動產出與科研成果的轉化並不成正比。無法高產的研究之路注定難以符合追求量化考核的學術標準，正如作者所言：「人大清史所的師友學長，長年支持我的這項『試錯性』研究，在量化考核幾乎摧毀人文學術的今天，我的這類近乎任性的歷史田野考察，得到了所領導黃興濤、夏明方、楊念群的鼎力支持與最大程度的寬容。」（頁304—305）除了對作者表達敬意外，也不禁令人思考：如此專業化的領域，如此規模性的田野考察，以及「事倍功半」的研究項目，除了研究者自身具備相當的研究能力與堅韌的毅力外，勢必還需要各種天時、地利、人和的加持，方能成功。因此，從這個層面來說，本書實為難以複刻的研究。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如此專業化的研究，又如何融入更大範圍的學術討論之中呢？民間秘密宗教研究除了與本領域的研究進行對話，能否與其他領域的史學研究一起討論更為宏觀的問題呢？比如，針對前述碧天寺教案中民間教派「不避官府」的「反常識」行為，可以推斷國家力量在地方社會的實際影響力有限，進而可以從此角度進入學界所關注的「國家—地方」關係問題的討論中，遺憾的是作者並未沿此方向深入。又如，作者在第三章中充分吸收了衛所制度的研究成果，將李賓家族的生活軌跡套進衛所體制的框架之中，但卻僅僅是藉衛所研究來推測李賓家族的活動，沒有透過李賓家族的案例反哺衛所研究，也沒有展開學術對話，就本書的水準與定位而言，不應僅止於此。因此，回到前面提出的問題，如何將本書融入更大範圍的學術討論之中，似乎是作者可以進一步深入思考的點。

綜合來說，本書不失為近年來一部優秀的明清史著作，在對民間教派寶卷的解讀上尤為亮眼。相信本書同李世瑜《現代華北秘密宗教》一樣，未來也會是民間秘密宗教研究，特別是白蓮教研究領域繞不開的著作。

陳凌宇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